

历史的地理枢纽

[英] 哈·麦金德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历史的地理枢纽

〔英〕哈·麦金德 著

林尔蔚 陈 江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5年·北京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GEOGRAPHY
and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London, 1951

(根据伦敦英国皇家地理学会1951年版本译出)

ÌSHÌ DE DÌLÌ SHÜNÛ

历史的地理枢纽

[英] 哈·麦金德 著

林尔蔚 陈江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 12017.305

1985年10月第1版

开本850×11681/32

198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47 千

印数 5,500 册

印张 2 1/4

60 克纸本定价: 0.49 元

译者前言

本书包括英国近代地理学鼻祖哈·麦金德的两篇论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与《历史的地理枢纽》。两篇文章虽然都不很长，影响却广泛而深远，特别是后者，我们就以它作为书名。

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在1887年1月份宣读，立即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应，把英国的地理教学推到一个新的阶段，并奠定了今日英国地理学的思想基础。这篇论文被认为是英国地理学的一篇经典文献。《历史的地理枢纽》于1904年1月份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则影响到世界政治。八十年代初，一个美国人把此文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潘恩的《常识》等十五种书并列，称为“十六本改变世界”的“巨著”。

《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篇论文所以能影响世界政治，被人们作出这种或那种评价，是因为麦金德在文章中提出了“心脏地带”的论点。他是第一个以全球战略观念来分析世界政治力量的人。他的观点得到德国纳粹地理学家豪斯霍费尔的赞赏，成为德国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来源之一。麦金德后来为自己辩解道：在他宣读这篇论文的时候，“远远在有任何纳粹政党问题之前”。但是，我们知道，思想的传播是不受时间和空间的约束的。

这篇论文是地理学史上争论很多的文章之一。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联系麦金德宣读这篇论文时的历史背景来进行分析是很有必要的。当时，大英帝国正处于积极向外扩张、殖民的势头

上，麦金德的这篇论文无疑从英国争霸世界的考虑出发，因而，在论文宣读以后进行讨论时，有人为“会议室里”“一部分座位并没有内阁成员在座”而“感到遗憾”。

如何看待地理环境与人类的关系是地理学中的重大问题，麦金德在这两篇论文中，显然强调了地理环境的支配作用。

这两篇论文都是西方地理学的名作，它们有很多偏见，但是集中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的思想，成为一种思潮的代表，值得我们去涉猎，去剖析，去研究，因而，我们特把全文译出。吉尔伯特的《引言》，对麦金德的生平和麦金德作这两次演说时的背景，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有助于我们深入研究这两篇论文。

在此书即将交付印刷厂之际，我们写了这篇简短的《译者前言》，它并不是对麦金德这两篇论文的具体分析，只是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点看法，写出来供读者参考而已。最后，承河北师范大学葛以德教授对本书的某些部分给予仔细校订，谨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1984年12月

目 次

引言.....	E.W.吉尔伯特 (1)
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	(18)
历史的地理枢纽.....	(44)

引 言

E. W. 吉尔伯特

这本小册子是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两篇论文的重印本。这两篇论文都是向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第一篇在1887年，第二篇在1904年，两篇论文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篇是关于英国的地理教学；第二篇涉及许多国家的地理学思想，甚至涉及国际关系的问题。现在予以重印，是因为除了在整套《学会年报》(Proceedings)和在整套《地理杂志》(Geographical Journal)中外，就很难找到这两篇论文了。这篇《引言》旨在对麦金德一生的主要事实勾划出一个轮廓^①，然后再略述一下宣读这两篇著名论文时的情况，以及宣读后的讨论摘要；对麦金德以后发展他的“枢纽地区”思想和这一思想对某些德国作者所产生的影响，也作些简要的叙述。

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一位乡村医生的长子，1861年2月15日出生于林肯郡的盖恩斯巴勒。他对公共事务的最早回忆可以追溯到1870年9月的某一天，当时，作为一个刚刚在盖恩斯巴勒中学上学的小小走读男生，他给家里带来了拿破仑三世和他的全军在色当投降普鲁士的消息，这个消息是他从贴在邮局门上的电报中得知的。他还记得挂在他家书房里一张著名的海军交战

^① 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的讣告刊登在1947年3月8日《泰晤士报》(Times)上；以及《地理杂志》第110期(1947)第94—99页，作者 E. W. 吉尔伯特 (Gilbert)；《自然》(Nature)杂志第159期(1947)第530—531页，作者 L. 达德利·斯坦普 (Dudley Stamp)；《地理》(Geography)第32期(1947)第136—137页，作者希尔达·奥姆斯比 (Hilda Ormsby)。

图，那是1862年3月在第一艘装甲军舰“梅里麦号”（Merrimac）和第一艘炮塔炮舰“班长号”（Monitor）之间进行的。

1874年，他被送到埃普索姆学院学习，他父亲想要他成为一名医生。1880年，牛津基督教教会向他提供一笔为期五年的物理学初级奖学金，同年10月他进入牛津大学。在这所大学里他走过一段光辉的历程，攻读过两个荣誉的学科——自然科学和近代史，曾担任该校学生俱乐部的主席，并在内殿（Inner Temple）^①获得律师资格。

从1885年起，他和一位同属于基督教教会的朋友迈克尔·萨德勒（Michael Sadler）一起参加牛津大学的扩展运动。他于1885年冬天和1886年周游全国，以一个美以美教会传教士的全部热情，宣讲他所称为的“新地理学”。在皇家地理学会几名著名成员听到这些宣讲之后，邀请他去作一次《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的报告。现在这里重印的就是这篇报告。在麦金德宣读论文后只有几星期，牛津大学就决定在地理学方面设立一个为期五年、薪水300英镑的讲师席位，由学会每年捐助150英镑。1887年7月，麦金德被委任为这一讲师新职。他担任牛津大学这个职务一直到1905年。由于他多方面的努力以及来自皇家地理学会相当大的财政支持，牛津大学于1899年创立了地理系。麦金德担任这个机构——英国第一个地理系——的主任，这是一个教员能够受到培训、并且可以获得具有公认资格的地方。牛津大学的扩展运动在雷丁特别成功，1892年基督教教会推选麦金德取得奖学金，并推荐他去雷丁工作。同年雷丁学院开办，麦金德作为该院院长一直工作到1903年。正如麦金德自称的那样，他是一名“兼职人员”，他在牛津大学和雷丁学院担任职务的同时，从1895年起还在伦敦

^① 现为法学协会。——译者

大学担任教师职务。这项职务最后成为伦敦经济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系伦敦大学的附属学院——译者）经济地理学的一个讲师席位，而麦金德一直到1925年才最后在伦敦大学的教学岗位上退休。^①从1903年12月到1908年，他还担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多年来，麦金德确实集中他的主要精力，力图使地理教学成为牛津大学、雷丁学院和伦敦大学的一门主课；但同时也不能忘记，他的地理工作并不完全是学院性的，因为他在1899年夏天还首次登上了肯尼亚山^②。

麦金德自从早期在牛津大学担任学生俱乐部的工作以来，对政治一直怀有强烈的兴趣。他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兴趣以及在应用他的地理学思想于政治的方法，在重印于此的第二篇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中都有例证，这篇论文在1904年1月曾向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但是正象他对地理上的学术研究工作使他成为这个领域的开拓者一样，他在政治上的理论研究也使他成为一名从事活动的政治家。1900年进入沃里克和利明顿议会与1909年进入霍伊克自治市议会的两次尝试失败以后，1910年1月，麦金德在格拉斯哥的卡姆拉基（Camlachie）选区以434票的微弱多数当选。同年12月的普选中，他甚至只获得26票这样更少的多数，继续代表

^① 1923年伦敦大学授予麦金德个人以教授的头衔，但伦敦经济学院直到1925年麦金德退休之后，才建立地理学讲座。

^② 关于探险的报告，详见 H. J. 麦金德著《到英属东非肯尼亚山山顶的旅行》（A Journey to the Summit of Mount Kenya, British East Africa. 按肯尼亚现已独立。——译者），《地理杂志》第15期（1900）第453—476页；《登上肯尼亚山》（The Ascent of Mount Kenya），《登山杂志》（Alpine Journal）第20期（1900—1901）第102—110页。1930年，麦金德还就这次旅行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作了一次简短而生动的报告（《1899年在肯尼亚山》（Mount Kenya in 1899），《地理杂志》第76期（1930）第529—534页）。这篇文章是英国探险家在探险史上关于特殊事件的一系列演说中的一篇，而且成为皇家地理学会一百周年庆祝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卡姆拉基选区一直到1922年他在选举中失败为止。1919—1920年，他是英国驻南俄的高级专员，并在回国时，获得爵士称号。1919年他担任英国皇家所得税委员会和英国皇家发明专利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1925年担任食品价格委员会的委员。1920年他担任帝国航运委员会主席，并且保持这个职位到1945年。1926年他成为英国枢密院顾问官兼帝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担任此职一直到1931年。

1886年，麦金德被选为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并终生与它保持联系。从1909—1912年，又从1928—1936年，他在皇家地理学会的理事会工作；从1932—1936年他担任这个学会的副主席；1946年他获得佩特伦（Patron）奖章。1947年3月6日，麦金德逝世于多塞特郡的帕克斯通（Parkstone）家中。

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

正如早已叙述过的那样，麦金德在促进成人教育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他总共给牛津大学扩大讲座讲过六百多次课。负责1885—1886年举办这些讲座的委员会在报告中说：在莱茵河畔阿什顿、伯里、巴思、罗瑟勒姆、盖恩斯巴勒和林肯等地，“麦金德先生向大班级的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士所作的演讲是十分成功的”。麦金德扩大讲座一些最初教程的主题是“新地理学”^①，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助理干事H.W.贝茨（Bates）邀请麦金德到萨维尔（Savile）街地理学会所在地去见他。看来是地理学会的前名誉干事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听到这些讲座的情况，建议贝茨要求麦金德把他关于“新地理学”的意思写下。一篇麦

① J. F. 昂斯蒂德：《麦金德和新地理学》，《地理杂志》（J. F. Unstead, H. J. Mackinder and the New Geography, Geog.J.）第113期（1949）第47—57页，麦金德关于《新地理学》（1886）讲座的印刷摘要仍有藏书。

金德论文的草稿于是被提交给当时的学会名誉干事克莱门茨·马克姆 (Clements R. Markham)，他以极其热情的词句向学会理事会作了报告，并预定在适当的时候邀请麦金德到学会演讲。

麦金德的论文《地理学的范围和方法》是在1887年1月31日宣读的，学会副主席理查得·斯特雷奇 (Richard Strachey) 将军是这次会议的主席。《学会年报》记载说：这次演讲，“是通过图表和利用屈光灯和灰光灯作工具，把典型的地理观念投影在银幕上来加以说明的”。在演说中，麦金德有力地抨击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理事、少将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 (Frederic Goldsmid) 爵士，于1886年9月在伯明翰任英国皇家学会 E 分会 (地理) 主席就职演说时所表示的观点。现在很难回忆那次大胆演说在群众中难免会引起的强烈感受，但是我们应该记住，在举行这次会议时，麦金德还不到26岁，而且还只不过是一名学士。因此，“一位尊敬的海军将军——坐在会场前排的学会理事，在整个演说过程中嘴里不断唠叨着‘该死的厚脸皮！’”这就不足为奇了。麦金德在以后的日子里，很乐意谈论这件事，并且说当他宣读论文时^①，他是“一名年轻的革命者”。当时在学会理事会中有两位海军将军：林赛·布赖恩 (Lindesay Brine) 将军和 F.L. 麦克林托克 (McClintock) 爵士将军。讨论这篇论文的时间很长，而且十分热烈，休会到2月14日下次会议继续举行。斯特雷奇将军仍然是会议的主席。麦金德从他的论文提纲开始，并作出另一个地理学定义来补充上次会议他所作的定义。这次，他把这个主题解释为“分布的科学，那就是探索地球表面事物一般排列的科学”。正如他在论文中所写的那样，他力陈“把自然地理和政治

① 《苏格兰地理杂志》(Scot. Geogr. Mag.) 第47期 (1931) 第323页。

地理结合起来”^①的必要性。麦金德解释说，他给地理学下这样定义的理由是基于如下信念：“十个探索地理学的学者中必然有九个是从人类的立场来进行的”。他又说：“他们希望把世界作为人类环境来研究”。弗雷德里克·戈德斯米德爵士——这位他的意见受到麦金德非常猛烈攻击的人，在讨论中第一个发言，他用相当长的时间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弗朗西斯·高尔顿接着发言，他对麦金德的观点表示赞赏。他把地理学解释为一种艺术，对“特殊地区中较有兴趣的特征进行生动和有联系的描述”，并且预言麦金德“肯定会在地理学教育上产生影响”。接着高尔顿发言的是巴思学院院长T.W.邓恩（Dunn）和巴特西教育学院院长卡农·丹尼尔（Canon Daniel）；前者支持这篇论文的观点，后者则给予较多的批评。有趣的是，在宣读卡农·丹尼尔的发言时，墙上挂有三幅印度斯坦（原文如此——吉尔伯特）地图来说明麦金德的论文。他说：“一幅表明人口，另一幅表明雨量，第三幅表明山脉和水系”，并且对这三幅图之间“非常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作出评论。伦敦皇家学院地理学教授H.G.西利（Seeley），表示基本上同意麦金德提出的观点。下院议员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后来是布赖斯子爵），热烈支持麦金德，并且“高度赞扬他论文中所表现的特点：异常清楚、逻辑周密和深刻的哲学观点”。对于布赖斯来说，“地理学既不是一种描述的、也不是一种分布的科学，而是一种因果关系的科学，它的职能是显示各种自然特征的原因，首先对于相互之间、其次是对于人类所起作用的途径”。他总结说：“如果在大的学校里

^① 麦金德在当时流行的广泛意义上使用了“政治地理学”这个词，大致相当于现在所说的“人类地理学”。1888年，在他所著的《地理学的家庭读物要旨》（Syllabus of Home Reading in Geography）一文中，他抱怨政治地理学是“地理学在人文方面并不适当的一个名词”。

有一个行将成为教员的二十人的班级，要接受诸如麦金德所推荐的在地理学上的训练，那将极大地吸引着学生们的思想，不仅是地理系，而是所有与地理学有关的每一种学科也都会变得生动活泼，并且处处渗透着与地理学有关的概念，而相同的概念和方法也会在英国的学院和学校中逐渐渗透和推广，直到人们对地球表面的渊博知识成为常识的一部分。”

经过另一位理事会成员E. 德尔马·摩根 (Delmar Morgan) 几次观察之后，道格拉斯·弗雷什菲尔德 (Douglas Freshfield) 作了一次长篇讲话来支持麦金德的观点。他从宣读马卡姆写给理事会关于麦金德论文的书面报告摘要开始，其中他曾经说过：“宣读和认真地考虑这篇论文将在我们学会的历史上形成一个新纪元”。弗雷什菲尔德用叙述麦金德的牛津大学扩大讲座在曼彻斯特受到初级学校教员热烈欢迎的情景，来回答那些怀疑论文所建议的地理教学方法能否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批评者，弗雷什菲尔德有信心地说：“地理学会由于鼓励这种教学，无论在大学或初级中学都会得到很大好处”。他在结束发言时，要求所有旅游者都应该受到训练，以便他们能更加生动地写下游记。他说：“训练旅游者洞察力的一种手段是在英国的学校和大学里进行比较高级的地理学教育”，他还宣称：“保证做到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聘请有能力的教员，而在培养教员方面，他们必须确保地理学在培训教员的大学里有它的恰当地位”。麦金德对“《学会年报》里不平常的一致同意”感到意外，在他作了简短的回答之后，会议主席在总结时也作了同样的简短讲话。

对这次演讲所作的考察，可以使读者看到许多现在在地理思想和地理教学中很一般化的概念，都是首先由麦金德设想出来的。例如，区域观念是他的论据中不明言的部分，显然，赫伯森 (Herbertson) 不应该因为他把区域观念介绍到英国地理教学中

来，就象人们常常归功于他一人那样，获得这一成就的全部荣誉^①。以后在1887年，在曼彻斯特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麦金德宣称他在牛津大学的正规年度课程之一，将“经常是对一个特殊区域所作的分析”^②。他又一次首先把地理学作为跨过“自然科学和研究人类之间”鸿沟的桥梁的创始人之一。这篇论文，正如J.F.昂斯蒂德博士不久前所说的那样，是“英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一篇经典文献”，它对现在地理学的地位具有影响^③。当地理学被分割成许多狭窄的专门学科的时候，无疑人们应该记住麦金德关于这门学科基本统一的观点。

历史的地理枢纽

麦金德的这篇论文《历史的地理枢纽》是于1904年1月25日向学会宣读的，学会主席查尔斯·马卡姆(Charles Markham)^④爵士是这次会议的主席，他于十七年前，担任学会干事时曾对麦金德的第一篇论文以十分赞赏的态度向学会作过报告。在宣读这篇论文的前一个月，麦金德被任命为伦敦经济学院的院长。他还是牛津大学的地理学讲师，直到第二年，这个职务由A.J.赫伯森博士接任后才辞去。赫伯森博士的著名论文《主要的自然区域》(The Major Natural Region)^⑤是一个月以后在1904年2月29日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历史的地理枢纽》用了五幅地图来加以说明，这五幅地图这里都复制了，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被称为《力量的自然位置》的著名第五幅地图。很清楚，这两

① 除了麦金德和赫伯森以外，许多人在把区域思想介绍到英国地理教学上都起过作用，特别是H.R.米尔(Mill)的贡献一定不能忘记。

②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学会年报》第90期(1887)，第699页。

③ 《地理杂志》第113期(1949)第53页。

④ 疑原文有误，似应为克莱门茨·马卡姆。——译者

⑤ 《地理杂志》第25期(1905)第300—312页。

位牛津大学地理学家都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根据“自然”单元加以考虑的。但是，当赫伯森的《主要自然区域》图是用莫尔韦德（Mollweide）投影进行绘制时，麦金德的《力量的自然位置》图则还是用墨卡托（Mercator）投影绘制的——它的周围所画的椭圆形使这一事实显得不那么明显了。有人曾经对麦金德为这张特别的地图使用墨卡托投影提出一些批评。如果麦金德的设想被重新绘制在以他的“枢纽地区”为中心的方位等距离的地图上，人们就会对于在与其他大陆的关系中这个地区的位置，得出一个比较清楚的概念。因为使用墨卡托投影下的地图，掩盖了“枢纽地区”和北美（北极的“冰海”从这里把它们分隔）之间的真正关系。

麦金德论文的读者应该记得，在1904年2月8日，也就是麦金德的论文向学会宣读只有两星期之后，日俄战争就爆发了。在英国，那是一段强烈的恐俄时期；第一个英日同盟协定在1902年1月签订，使这两个国家更加接近的第二个协定在日俄战争结束的1905年8月签订。第二个协定规定了相互维护日本在朝鲜的利益和英国在印度的边界。在这种关系上，考虑一下麦金德的思想是很有趣的，他认为朝鲜可能成为一个“桥头堡，外部的海军可以从这些桥头堡支持陆上部队来迫使枢纽联盟也部署陆上部队，从而阻止他们集中全力去建立舰队。”

这篇论文的讨论会是斯潘塞·威尔金森^①用以下这些话开始的：“当我在聆听这篇论文时，我遗憾地看到会议室里有一些座

^① 麦金德对1903年由斯潘塞·威尔金森（Spenser Wilkinson）主编的《祖国的需要》（The Nation's Need）一书投过稿，他的一章（第225—260页）涉及高等教育的学科问题。斯潘塞·威尔金森后来成为牛津大学军史系的奇切利教授，（Chiclele, Henry, 约1362—1433年，英国大主教，曾在一些教会事务和政治谈判中起过作用——译者），而且担任牛津大学地理委员会委员多年，这个委员会负责管理牛津大学地理系的工作。

位还空着，我更感到遗憾的是其中的一部分座位并没有内阁成员在座”。接着，他讨论讲稿中所奠定的两种主要原理。第一种原理认为世界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因而也就成为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他说：自从近代利用蒸汽改进航海技术以来，这样的统一整体已经出现。他认为麦金德所作出的第二种原理，也就是最主要的是“俄国新近的扩张对世界的极端重要性”。他批评麦金德为他的地图使用墨卡托投影来说明论文的主要观点，因为那个投影夸大了大英帝国的面积。斯潘塞·威尔金森相信：大不列颠如果能维持住它的海军力量，它就能“掌握对大陆地区发生作用的各种不一致的力量之间的平衡”。他还认为日本能够“在亚洲大陆的东缘产生决定性的和有影响的力量，正象不列颠群岛那样，人口虽然少些，在欧洲大陆却产生着决定性的和有影响的力量。”

接着发言的是托马斯·霍尔迪奇 (Thomas Holdich) 爵士^①。四分之一世纪之后，在两次战争之间的年代里，跟麦金德一样，他的言论常常被德国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费尔 (Karl Haushofer) 将军所引用。豪斯霍费尔最爱引用霍尔迪奇的一句话是：“由于对地理的无知而付出的代价是绝对难以计算的”。在评论麦金德的论文时，霍尔迪奇想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中亚细亚人口超乎寻常地溢出的原因。他认为所有造成这些迁徙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的自然条件发生了明显变化”。托马斯·霍尔迪奇爵士作为测定智利和阿根廷之间边界而设立的仲裁法庭成员之一，在南美度过了1902年的大部分时间。因此，人们很感兴趣地注意到他拥有与麦金德相同的观点：即南美可能是“对绕着俄国南部转动的内部力量施加压力的外部力量地带”的一个可

^① 托马斯·霍尔迪奇爵士的《印度》(India)，收集在麦金德主编的《世界区域》(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丛书里，1904年出版，这一年也是这篇论文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一年。

能因素。他认为南美作为一个海军强国的潜在力量是非常巨大的。

后来成为英国海军大臣和主管印度事务国务大臣的L.S.艾默里 (Amery) 先生，在讨论会中作了最长并且肯定是最有启发性的发言。在1902—1908年期间，艾默里和麦金德两人都是一个名叫“系数” (Coefficients) 的小小的晚餐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在这里讨论当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米尔纳 (Milner) 勋爵和H.G.韦尔斯 (Wells) 也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①。艾默里先生和其他发言者一样，批评了麦金德关于俄国是希腊的继承者的观点，但人们可以在第59页的脚注中看到，在重新考虑了这件事之后，麦金德仍不改变他的意见。艾默里接着指出，那些居住在草原的人民，虽然数量很小，但经常享有机动性的优点。他举两年前于1902年结束的南非战争作例子。他说“整个英国军队都为企图压制四万到五万生活在干旱草原上的农民而忙得不可开交”。一张麦金德在演讲时给大家看的照片，使艾默里先生想起一个布尔人的突击队员越过浅滩时的情景。他认为“拥有广大草原地区的俄罗斯帝国，已经不在古老的草原人民的手中，而是成为真正的农业世界的一部分，经济上它已经征服了草原，并且正在把它变成一个伟大的农业工业强国”。他指出：麦金德描写的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大部分已经过时了，现在是铁路的机动性和海上的机动性的问题。他还预言，这两方面的机动性都将“由航空作为动力的一种手段来加以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地理分布必然丧失它的重要性，而成功的、~~以强密地掌握最大~~工业基础的那些国家”。他最后作结论说：“~~在大陆中心还是在~~在岛屿上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哪个民族拥有工业的力量~~是~~文明的标志”。

^① 韦尔斯在他所著的《自传中的实验》(Experiment in Autobiography, 1934年第760—765页)，把艾默里和麦金德描绘成属于这个俱乐部的两个比较典型的帝国主义者。